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

1999年10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上午10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0(续)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除了加强联合国作为中心机制,确保这一正在出现的多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外,别无选择。报告所述期间的标志是科索沃和伊拉克的严重挑战,它确定了国际社会除了确保联合管理国际关系,别无其他普遍的工具。

全面加强联合国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大会本届会议讲话时为制定21世纪的世界概念而提出的倡议的关键组成部分。

强大有效的联合国将使我们能够实现这一倡议的主要目标:在《宪章》所载国家间关系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创造一个没有暴力和战争、稳定和繁荣世界的商定参数,并针对最复杂的全球挑战作出相应的集体反应。

这些挑战之一是由武装冲突引起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坐视成千上万的人民遭受苦难和其基本权利受到有系统的侵犯。最近的经验表明,维持区域和国际稳定直接取决于预防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然而,采取违反《宪章》的行动不能制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一点也很明确。只有使用合法的办法才能压制非法。文明世界各国只有以这种方式在

国家一级解决其国内问题,同样的标准、即法治,也应构成国际事务的基础。

《联合国宪章》是对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作出反应的基本标准与机制。这些机制也完全适用于人为的人道主义危机。作为最后的手段,国际社会可使用高压措施,包括使用军队,但只有在严格符合《宪章》和根据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结论,即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和蔑视其宪章所规定的授权的执法行动,往往会破坏目前整个的国际安全体系。科索沃的经验已经开始给我们一个教训,国际社会应汲取这些教训,以避免重复未来可能无法纠正的错误。

这些非常基本的原则确立了我们人道主义干涉概念的作法。世界的发展无疑要求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得到发展,并适应当前的情况,但这一工作应在《宪章》的坚实基础上由集体来完成。这将使我们能够找到一致同意的决定,其合法性不会在正式的声明或普通的非正式谈判中受到质疑。

俄罗斯准备进行这一值得赞扬的工作。此外,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起进行这一工作。让我们联合起来确定国际社会按照《宪章》进行执法行动的标准和法律框架,包括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让我们按照国际法对人道主义危机制定一种明确、而且可以普遍接受的解释,以便避免在这一领域采取双重标准,秘书长对此已向我们提出适当的警告。俄罗斯总统在提出他的建议时考虑的正是这一点,他提议在千年首脑会议

上审议全球化时代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法律问题。我们准备以各种方式就这一问题进行尽量广泛的对话。我们支持埃及的倡议,即在大会和平纲领问题工作组的框架内,就与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国际反应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以期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制订商定的建议。

我们只能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预防危机和冲突在所有方面都比解决危机和冲突以及愈合由它们造成的创伤花费要少。报告载有旨在扩大国际社会可动用的预防措施宝库的若干有希望的想法和建议。人们吁请联合国和秘书长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包括进行斡旋在内的关键性作用。前后一致地巩固用于预防行动的综合办法,其中不但包括政治也包括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的努力,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国际预防措施还应建立在坚固的法律基础上。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适当地遵守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已变得越来越多重性的维持和平行动,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为政治解决危机和冲突创造有利条件的有效手段。将科索沃危机重新纳入在安全理事会控制下的联合国合法框架,以及计划中在非洲和东帝汶等地部署和扩大若干和平行动,都表明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中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成功地完成目前关于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潜力的工作,首先是从提高准备工作的质量以及加快部署和平行动的观点来说,是维持这种作用的保证。尽早切实执行联合国待命安排制度,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方式。

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和平行动严格的政治控制,主要是在必须由安理会对涉及执行内容的任何行动,其中包括在区域和联盟形式中进行的各种行动,作出决定的政治控制,仍是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构成原则和标准。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按照《宪章》第八条的规定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合作。这种涉及从预防性外交直到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整个系列的维持和平活动的相互作用,其基础应该是合理的分工,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不都应导致淡化联合国在这一最重要领域内的中心作用。

俄罗斯一贯支持联合国旨在反对“不文明”社会的努力。人们吁请联合国在为反对恐怖主义这一种对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最危险挑战而调动多边努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此外还必须加大对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而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已将这种斗争放在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中。我们打算积极协助

尽快完成编制一项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公约。俄罗斯高兴地看到迄今为止在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框架内所取得的进展。根据《宪章》并充分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职权,未来的法院将成为国际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联合国严重财政危机的任务依然是一项紧迫事项,因为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为了更有效地对我们时代的各种挑战作出反应而改革并加强本组织。至关重要的是要消除危机的根本起因——会员国不履行其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以及在会费分配比额表与国家缴纳会费的真正能力两者之间继续存在的差别。尽管俄罗斯还存在经济困难,但它已全额支付了向联合国经常预算的缴款,并不止五次减少了它拖欠本组织的债务。这真正以行动而不是言词显示了我们在各方面支持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将一贯地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同时与所有有关国家进行建设性的互动。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希望感谢秘书长作了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全面、客观的报告。该报告向大会提供了关于我们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的综合情况。但我要着重就报告的一个特别方面进行评述,同时又考虑到他对大会所作的重要的发言。

目前需要国际社会重视——说得确切一点是关切——的任何问题,莫过于如何对人道主义危机及其有时会对国际和平造成的威胁作出反应的问题。在逐步展现的其后果十分严重的危机压倒了国际上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变得具有新闻价值时,公众舆论就会希望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并提出有益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良知要求我们采取行动,而《宪章》已赋予我们这样做的手段。外界衡量联合国政治活力的标准,是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能减轻人的苦难而同时又是平衡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但是,一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因此,秘书长将人道主义问题及其所有的范围广泛的影响作用提交大会讨论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他在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也使他有资格这样作。如何对付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并非新的问题,尽管对它充分的影响作用依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事实上近年来的各种挑战,已使国际社会不但通过各人道主义机构的经常性活动以及联合国的协调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具体决定甚至是通过各种单方面行动,对秘书长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提供了务实的答案。但是,在后者,其情况是含混不清的。国际社会有一部分人提出的各种关切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得不同意秘书长对最近一些事态发展的合理关切。类似于我们在东帝汶和科索沃看到的局势不应再次发生。但是我们如何能避免呢？首先，国际社会必须深入讨论面对所述问题的所有多重表现和影响深远的复杂性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说理有条不紊，请允许我们以提几个初步问题作为开始。

我们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某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不能只靠预防措施来解决？什么时候某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成了国际关切事项？因此，什么时候某一种具体的局势会引发联合国的参与？我们如何确定哪些措施可有理由地使用在这些情况之中？这些就是必须予以讨论的观念性问题。用以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参数现在尚不明确。

在试图制订这些准则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全力对付人的事务的复杂性和无法正确估计的方面：人道主义悲剧的起源；违反法律行为的性质；侵犯行为的规模；以及是否已用尽了旨在处理该局势的各种和平的、以同意为基础的努力。

此外，还有可向我们提供如下指导方针的某些基本原则。自上个世纪以来已制定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人道主义行动要求行动提供者不偏不倚，并要得到行动接受者的同意。人道主义悲剧是复杂的现象，它们要求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参与，根据第46/182号决议附件中的指导原则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的干预必须始终依然作为最后手段。预防和反应是相辅相成和同等重要的，但正如秘书长所说，最好的战略是预防。然而在预防失败时，国际社会可被迫采取强力措施。

然而，如何对付外来干预的进退维谷的局面，并对付它所提出的关于主权的局限和使用武力的问题？我们都同意秘书长的意见，认为存在着超越国界的权利。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它说明在最重要的人道主义利益遭受危险时，联合国能如何积极地协助实现和平的改革。

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的承诺明确地体现在作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基础的广泛协商一致意见中。

我们还十分清楚地知道，主权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并将依然如此。这绝不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概念。此外，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普遍解决办法不能够通过侵犯国家主权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国家间的相互同意和协调一致的谅解才能实现。不然，选择性行为必然会压倒《宪

章》载明的最根本的价值观——普遍参与为解决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问题而确立全球性办法的活动。

秘书长的发言提醒我们，现在存在着大规模和有系统的侵犯行为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造成威胁。巴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可发挥作用。例如在关系到处境困难者不受妨碍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机会的权利方面，安理会可以而且应该促进培养一种遵从的气氛。最近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的辩论已经表明，安理会和大会在这一事项中有着合作的余地。

但是，根本性的挑战是明显的。我们将如何确定一套前后一贯的可行的标准，用以制约国际社会对诸如科索沃、东帝汶和安哥拉境内展现的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安全理事会可动用的手段多种多样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但必须克制、谨慎地予以运用。按照《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应始终是最后一着的手段。如果国际社会决定采用这种最后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必须受时间的限制，必须有利于政治解决，也必须本着透明度和负责的精神采取这些行动。

显然，未来的道路要求将政治利益与人道主义价值结合在一起，使安全理事会的行动真正反映国际社会的需要和理想。做到这点并非易事，但我们不应避而不讨论确定何时与如何进行干预的普遍标准的可能性。

我们的努力有两个根本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绝对尊重《宪章》，并尊重安全理事会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武力的权限，这意味着一贯遵守各项规则，并遵守改变这些规则的程序；第二，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承诺对同样的问题给予同等的重视。对于在地球某处的人的苦难所表现的义愤，不应该超过如果这种苦难发生在其他地方时它所表现的义愤程度。正如秘书长强调的那样，人类毕竟是不可分割的。

秘书长的报告没有将其本身局限于人道主义问题，但与这些危机局势密切相关的是，本组织未能将在它建立时要与之斗争的各种重大问题扭转过来。事实上，这些危机都是在冲突战胜和平、贫穷战胜发展、政治暴力战胜尊重人权以及仇恨战胜容忍和同情的时候发生的。

要使这些人道主义悲剧脱离它们的背景显然是不可能的。最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平等现象会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如此普遍盛行，为什么政治上专横独断的行为和不容忍会如此地持久。

联合国必须本着寻求和探索的开放精神,开始进行这种范围广泛、未经探索的辩论。我们必须在下一个世纪谋求在人类的普遍愿望与国家地位的要求之间发展一种新的协同作用。但是,我们依然处在这种讨论的最初阶段。应在本届会议之后进行的深入辩论将具有的价值,至少是会提高联合国会员国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水平。

巴西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极其敏感的,认识到进退维谷的局面是真实的,并认识到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法。但想要避免这种讨论是无益的。巴西一贯致力于普遍促进人权和巩固国际法,以此作为防卫手段,反对强权出权力这一概念的一切表现形式。

因此,我们已准备并愿意为大会的努力作出贡献,为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找到现实与平衡的答案。

弗里切女士(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我表示我们衷心感谢秘书长作了我们面前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这份文件和他在9月20日所作的补充口头说明一起,是旨在恢复联合国在谋求和平与安全的合法作用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努力,因此它是真正领导地位的体现。

尽管我国外交部长在她于9月24日的发言中已对秘书长的一些想法作了评论,但我们仍然欢迎有此机会来提出一些更为详尽的评论,其着重点是我们视为报告的要点——即人们越来越称之为“预防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用语是恰当的,因为任何特定领域内有效的预防行动需要有某种概念性的框架,而且可以说,需要有国际社会的某种共同的思想形式。这样一种思想形式的发展显然不可能是一种单一行为的结果,它只能是作为一种持续和持久的进程——一种我们都应促进并参与的进程——的结果而得到实现。

在过去几年中,联合国已稳步地发展其预警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有效预防的关键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不足的是另一个关键成分: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就我们联合国而言,说明这种不采取行动后果的主要实例,是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行为。预警系统已经建立,并正在发挥着人们希望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1994年出现的各种事件已得到了详细得令人震惊的预报,但由于缺乏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国际社会——这就是指我们所有人——成了无所事事的袖手旁观者。令人更为气愤的是,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义务——不但有道德上的义务,而且有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条款应尽的义务——来制止这些行为。

正如秘书长说明的那样,赞成预防的理由是难以抵挡的。预防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同时节省几十亿美元,并可使政治精力和巨大的财政资源用于其它目的。关于预防的问题不能是:“它对我们有什么用?”,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实在是太明显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是什么在阻碍着我们有系统地实行预防?”

“预防文化”的概念要求对不同种类的问题采取综合的解决办法。不过显然的是,通常造成缺乏政治意愿的那种勉强态度和偶尔的反对态度,在碰到预防冲突时将会特别强烈。当绝大多数的武装冲突是内部性冲突时,人们可以而且一直将预防办法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事实上,秘书长自己在介绍报告时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小国——应该说是十分小的小国——我们对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一贯十分敏感。我们将是最不可能自愿放弃我们主权的国家之一,更不用说会要求其他国家这样做了。我们似乎认为,对主权这个词的传统理解已不再使我们能对付我们世界已变化的现实,而且主权已不再具有我们大多数人或许仍然习惯于认为它应具有的那种含义。这并不是政府间进程的谈判结果;它只是反映了迅速变化中的各种情况,而全球化的现实最显著地对这些情况作了重新界定。国家主权依然是本组织的基石,但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予以解释和应用。

很久以来就认识到,环境政策的依据必须主要是区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利益,而不能仅仅依据已过时的对主权的理解而采用目光短浅的国家政策。同样显然的是,那些损害人的安全——无论是社会、经济、人权和任何其他有关领域内的政策——因而对整个区域造成的负担已足以威胁其稳定的政策,是不应该由对其负责的国家酌情作出决定的。我们必须继续本着团结的精神来减轻人的苦难,但我们也必须日益加强对付这种苦难的根源;毕竟,这是作为联合国基础的思想。

秘书长根据去年的某些事件正确地提出了他对本组织未来的一些理想观点。许多方面的人对《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有可能受到削弱一事表示关切,我们对此有同感。没有一个有声誉的安全理事会,就没有一个有声誉的联合国。许多人认为安理会的改革是一件毫无希望而且多少是令人厌烦的工作,因此安理会改革的焦点必须放在核心问题即否决权问题上。

内部武装冲突的扩散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而且我们认为,预防的必要性是正在出现的共识的主题。如

果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就几乎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已几乎成为我们最关心问题的列支敦士登的主动行动。我们依然坚决认为重要的是发展各种机制,使各国对付在其领土范围内的无论是连绵不断或公开化的紧张局势的根源,从而防止爆发可能以武装冲突形式出现的暴力行为。对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并在有关国家与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之间的对话为基础而行使的自决权进行充分探讨,将在大大有助于实现我们防止武装冲突及其所有破坏性后果这一共同目标。我们希望我们能找到进行必要工作的政治意愿。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概述了过去12个月期间本组织工作的报告。该报告使我们除其他外确定了我们已在哪些领域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同时也确定了在哪些地方尚未实现我们已提出的目标。此外,该报告全面而详尽。它提出了对许多问题的区域性观点,我将简单地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谈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合作促进发展。合作促进发展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必不可少的补充。报告认识到,在这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可能通过规划良好、协调和有充分经费的国际行动来面对发展的挑战。因此,联合国发展援助是加强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代表团赞赏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方面所采取的各种主动行动,我们还希望,于1997年成立的联合国发展集团将有助于迎接这一挑战。

根除贫穷依然是联合国的中心目标之一,尽管不幸的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秘书长的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有超过十五亿的人民,其中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每天只靠不到一美元的钱过活。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赤贫状况中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缺乏住房和粮食无保障的情况又进一步加剧了贫穷。

因此,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报告,认为根除贫穷的政策要求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各发展机构改善危险评估和预警战略。我们还欢迎免于贫穷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构成了由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导的一项新倡议的基础,该倡议的目的是协助方案国家实现到2015年时将赤贫的程度降低一半的目标。

非洲的经济状况在继续恶化。秘书长的报告提出了关于非洲的可怕的经济统计数字,并表明任何经济都不能在这种指标下维持其成长。如果非洲要摆脱贫穷,

如果非洲各国的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并从目前正在大量谈论的全球化中受益,就必须认真地对付这一问题。此外,执行秘书长报告中关于冲突起因和持久解决办法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建议因而是当务之急。

今天,国际战争正在继续使平民特别是最易受伤害群体的平民大量丧生。因此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报告,认为预警是实现预防性外交的最好办法,可使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各种悲剧得以避免。另一方面,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只有会员国作出坚定承诺,以也只有在提供充分资源的情况下,预防才能获得成功。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面临过许多挑战。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对所有区域的维持和平行动采用统一的标准。选择性的维持和平行动将只会是不完全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样,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不足,将使最需要得到和平与安全的人得不到和平与安全。此外,联合国在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它们防止了冲突再起,并为可持续的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努力必须持续下去。

而且,联合国开展的协助选举活动获得的丰富经验使许多国家受益,因为这些活动有助于建立机构和促进善政。

纳米比亚支持在预防外交、维持和平和建立信任措施等领域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赞赏联合国继续在训练方面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合作。

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我们坚信,各区域组织必须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运作。应该避免未经联合国具体授权而采取执行和平行动的倾向,因为这破坏安全理事会的信誉,破坏《宪章》庄严规定的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关于裁军问题,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

“有系统地逐步减少核武器,最终目标是将其彻底消除,仍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

[A/54/1,第119段]

在这方面,在我们进入新千年时,国际社会期待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取行动,在核裁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最重要的是在下个千年表现出它们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规定义务的决心。

关于制裁问题,纳米比亚支持这样的观点,这就是,在实施制裁之前,实行制裁的决议应该明确规定制裁的

范围和目的以及持续时间。制裁是以联合国名义实施的,联合国有责任解决因实施制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们期待联合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作出一致努力,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望。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与前几位发言者一样,感谢秘书长作了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并且在约两星期前在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提出这份报告。秘书长拟订这份文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他必须叙述联合国在一个对本组织而言非常困难的一年——在本组织各项原则受到挑战以及地位受到质疑的一年——里所开展的活动。而且,这份文件将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份这样的报告而载入历史,秘书长必须对文件内容字斟句酌。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他以他自己所说的“恢复联合国在追求和平与安全中应有的作用的最崇高责任”[A/54/PV.4]为指导原则,将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一些最根本问题提交给大会本届会议:下世纪人类安全和干预的前景。

对秘书长提出的各种反应办法的初步反应证明这个事项是复杂的,是具有争议性的。这也说明,在现阶段,各会员国不能就其各自的答案获得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应该在此也就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的分析,迄今所进行的辩论至少在从过去一年的发展中得出的三个实质性结论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一,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制度外,国际社会今天找不到另一个可行的替代办法——无论这个安全制度显示了何种缺陷;第二,不应质疑联合国对授权使用国际武力的垄断权力,因为这种质疑将威胁该安全制度的基础;第三,任何最近的发展都不能被视为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未经授权使用外部武力的先例。

我国代表团完全认识到,虽然这些结论非常重要,但这些结论并不能解决国际社会一直面临而且今后可能面临的所有困难局面。因此,我们深信,各会员国必须继续认真思考这个事项,以期就所有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大会主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确定应进一步采取哪些步骤,以便在这方面取得具体成果。主席先生,在这方面,你可以考虑是否行使大会 1997 年 7 月 31 日第 51/241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赋予这个崇高职务的某些权

力。具体而言,根据该决议第 7 段的规定,大会主席有权进行非正式协商,以讨论根据关于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的辩论,大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在一般性辩论以及秘书长报告中都强调从过去一年各种形势发展中得出的另一重要结论,这就是急需加强本组织的预防潜力。在这方面,我非常赞成秘书长的意见,联合国必须开始“从一个反应文化过渡到预防文化”[第 61 段]。乌克兰一向坚持必须加强联合国这方面的活动。与此同时,乌克兰仍然认为,在预防行动方面,尊重主权平等、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涉本质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范围的事项等原则非常重要。

报告目前的格式中有一项重要的创新,值得注意,这就是在关于发展的部分现在专列了关于非洲的部分。我国代表团非常希望在这个创新之后,联合国在对非洲国家的态度方面将发生真正的转变。我们几乎都同意,非洲是一个拥有无限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的大陆。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具体和有效步骤,协助非洲国家发展这个潜力,迎接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我国代表团对报告主要部分所载对本组织工作的主题回顾感到满意,这些部分包括联合国授权开展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然而,我谨表示希望,秘书长今后的报告应考虑到大会第 51/241 号决议关于该文件格式和内容的所有有关要求。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再次强调指出,我国继续支持秘书长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加强联合国,重申乌克兰决心促进这些努力。

莫利亚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阿根廷共和国祝贺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最近加入联合国。

我感谢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令人感兴趣的思想。报告要求我们在本组织即将进入 2000 年之际对本组织的状况进行反思。

这种做法表明,在本世纪末,联合国已经更多地关注个人、关注各国人民的悲剧,由于缺乏民主体制或由于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这些国家人民正在遭受苦难。今年,武装冲突数量增加,其中多数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各国国内,这些冲突对平民的影响令人震惊。同样,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人类和经济损失也大幅度增加。

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作出适当反应。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能力,帮助受害者,并且制定更加有效

的预防战略。这些战略必须为正在经历紧急状况的所有社会服务才能获得成功。根据大众媒体的重视或出于政治或地理因素而提供援助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阿根廷与秘书长一样,对于国际系统未平等重视某些冲突或灾难感到关注。

关于管理人道主义危机和联合国对这些危机的反应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问题应该由和平纲领问题工作组审议,该工作组随后可以向本大会提出一份报告,供大会下届会议审议。

联合国由于具有普遍性质和广泛的授权,在面临人道主义问题时有能力而且有权利采取行动。秘书长认为,为了在这项重要工作中获得成功,本组织必须摆脱反应文化,采纳预防文化,我们同意他的观点。

关于武装冲突,最大的挑战是在冲突后时期内促进建设和平。在短期和中期内,建设和平必须包括预防外交、预防性部署和预防性解除武装。这些是相互补充的战略,是避免非暴力争端演变成战争和保证这些争端不会煽起旧的战争火焰的最佳途径。从长远看,必须解决这些冲突的深刻根源:贫困、极端不平等和侵犯人权。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和平与经济发展、民主和善政直接相联系的综合办法。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特别是是安全理事会重要和独特的任务。鉴于目前存在的各种威胁的性质,安全理事会必须展现新的敏感性,而只有了解最容易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现实情况,了解在每个情形中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展现这种新的敏感性。阿根廷一向强调在面临这些挑战时必须要有这种认识。

我们鼓励在安全理事会内对与建设和平、武装冲突中平民和儿童、非洲局势、小型武器等主题进行公开辩论,这是实现我所叙述的目标的理想手段。这些辩论的成功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相当一部分国家已开始重视这些问题。

同样,阿根廷一向支持使安全理事会工作更加透明,鼓励与大会保持联系,与冲突各当事方以及与提供部队的国家保持坦率的对话。

我们在即将进入新千年期之际,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管制等方面尚有许多工作未完成。遗憾的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仍然存在,非法军火交易威胁着各国国内安全,也威胁着区域和全球稳定,我们对此仍然感到关注。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十年里,在裁

军、不扩散和军备管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是令人鼓舞的。

关于预防自然灾害问题,我们同意,现在急需采取措施,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在这方面,必须限制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

就发展而言,将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一项成就,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这项成就。阿根廷欢迎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制定与各国际金融机构相互作用的新方式。没有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参与,在发展方面取得进展是不可想像的。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紧急援助方案应该与长期发展倡议相联系。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系统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合作,处理全球化的挑战。

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特别法庭以及通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是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以及加强正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件。一个更加美好和更有组织的世界不能没有理想的法律机制,这些机制是尊重《宪章》的唯一保证。

关于秘书长提到的变化管理问题,我们支持使用先进技术,只要使用这种技术不损害它要为之造福的人或其用户,特别是只要使用这些技术不会惩罚那些由于技术发展程度较低而没有能力从使用这些技术中受益的国家。

我们支持改进财政预算的某些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指出秘书长报告第 293 段所提到的以结果为基础的办法。然而,从我们迄今所掌握的资料看,这种想法究竟可以如何帮助本组织实现其目标和计划以及这种主张的后果是什么,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将非常仔细继续分析这个概念。

查洛斯基先生(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今年,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在某些方面与以前的报告不同。我认为,这是因为今年本组织在许多领域经历了许多消极发展,秘书长非常正确地选择不仅报告本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在某些问题上保持沉默,而且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对本组织工作和今后国际合作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表评论意见。我们赞赏他的努力,并且赞同他的许多观点。

事实上,该报告促进了本组织在二十一世纪作用的讨论。我们认为,在这种讨论中,基本上需触及两个主题,当然每个主题下面有许多小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本组织《宪章》目前和今后的作用,第二个主题是该《宪

章》制定的各种机制的作用。这些机制是否足以适应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目前和未来的特点?是否适应全球、区域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宪章》提供的各种机制——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是否足以保证遵守《宪章》并且保证执行本组织通过的各项决议?

我们认为,回顾《宪章》是非常有益的。其目的应该是使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且重新确认《宪章》和国际法各项宗旨和原则。事实上,虽然《宪章》是五十五年前通过的,但其宗旨和原则不需改变。但是可以对其进行新的现代的理解,或作更加权威性的理解。我们必须对《宪章》各项规定有共同的理解。开展这项工作的机构当然应该是国际法院,此后,其工作将由大会进行审议。我们认为,应该在订于2000年9月6日开始的千年期首脑会议之前开展这项工作。

迄今为止,讨论的重点是各国主权原则、遵守人权义务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是由于发生了若干事件:科索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正如秘书长所指出,一个国家集团在未取得安全理事会授权情况下进行了干预;安全理事会授权并且得到印度尼西亚的同意在东帝汶进行干预;在卢旺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讨论的出发点应该是,对人权的关注是普遍性的,面临困难的人民应该得到援助。如果国际社会受到阻碍,不能援助处于困难局势中的各国人民,那么平等、正义、团结等等口号将没有实际意义。

我国马其顿共和国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局势中牵涉到国家主权原则。当科索沃难民潮开始涌向马其顿共和国时,我们有两项选择: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可以关闭与科索沃的边界,我们也可以打开边界并援助难民。人性和尊重人权的普遍义务占了上风。我们接纳了36万难民,其中35000人留了下来。我们的行动得到赞赏,我们接到许多承诺,我们希望这些承诺将会得到兑现。

所以,在面临必须防止大规模侵犯人权局面时,不能过分墨守或从法律上计较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原则。在这些情形下,人性应该占上风,应该根据得到接受的法律基础采取行动。这些法律基础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各国际文书确定的一系列其他人权法。毋庸赘言,我们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领土完整、国际边界不可侵犯等原则以及《宪章》制定的其他各项原则。

秘书长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的另一个方面是预防冲突问题。他非常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他的立场。大家知道,马其顿共和国是联合国第一个预防性特派团的东道国: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联预部队)。对联合国以及对马其顿共和国而言,这次行动非常成功。遗憾的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这项行动却停止了,各代表团都知道其中原因。应该认真分析这次行动的经验,在今后的行动中应该利用在此学到的经验教训。在正在酝酿冲突的世界各地区,派遣联合国预防性特派团比在悲剧发生后再派遣特派团更有实际意义。无需进行详述或争论来推行这种政策。

在报告中,秘书长正确地用很大篇幅讨论自然灾害的后果问题。去年以及今年,我们遇到了许多洪水灾害、地震、干旱等等。今后应该更加积极进行灾害预防工作。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已经有良好的组织,今后可以做得更好。

本组织重要性今后将取决于其各机构的工作,或者说应该取决于会员国在这些机构中的活动。我们不能说我们感到十分满意。我们有一位积极、有献身精神和远见的秘书长,和一个技巧高超的秘书处,但这是不够的。

我们认为,许多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大会的潜力尚未充分利用。我们不能掩盖大会经常被避开或边缘化的事实,当然应纠正这种情况。安全理事会的确工作十分努力,但我们关切它已经开始作为审议机构工作,这不是《宪章》设立它的用途。安理会的性质是本组织的执行机构。审议机构是大会。

事实上,除了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外,大会全年在主要政治事态发展方面几乎无所事事,尽管它根据《宪章》第十、十一和二十四条有义务。会员国,而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代表处于只能注视安全理事会工作的状况,尽管我已提及大会根据《宪章》第十、十一和二十四条规定应发挥作用。

如果这种令人遗憾的局势继续下去,大会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将进一步减少。为了改变这种消极情况并防止大会进一步边缘化,大会应开始工作,并全年讨论和平与安全议题。这将不损害安全理事会的地位或名誉。相反,安全理事会将更好地了解大多数会员国,而非仅仅其中15个会员国的看法。这可发挥巨大作用,安全理事会将作为本组织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执行机构运作。

我就说到这里,强调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报告所载资料,特别是秘书长准备就大会本届会议和明年届会讨论的许多问题发表看法。

内贾德·侯赛尼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赞赏并感谢载于文件 A/54/1 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应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不仅因为这是一份有益和资料详实的报告,而且因为他不断努力改进联合国业绩并提高其效率。

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再次有利于恢复讨论国际社会应如何处理人道主义大灾难。面对这种危机,对应立即采取行动以制止种族清洗严重罪行有协商一致,另一方面对谁有权采取行动有意见分歧。在主张对科索沃罪犯采取坚决行动时,我们赞同一些人的看法,即任何国际行动尤其是使用武力应产生于安全理事会,它是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我们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因缺乏协商一致而无法完成其任务,大会作为充分代表所有会员国的机构便应在处理任何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方面发挥其《宪章》作用。安全理事会在科索沃情况中无能为力是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这进一步要求限制使用否决权,以期最终取消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没有协商一致不使任何国家或一小组国家有权单方面采取处理冲突的行动,尤其在其它国家主权遭到严重侵犯时。我们认为,使用武力或其它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其它国家完整和主权——的行为破坏《联合国宪章》目标和原则。

我们不知道联合国有任何可行替代物,联合国是通过谋求相互接受的利益平衡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多边合作的独特机制。因此,加强联合国的中心作用——首先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效率——应在今后几十年一直列入议程。

维护国际安全体系的法律基础;必须扩大对人道主义行动的政治支持;不同区域要求不同安全政策以及应对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复杂的多学科反应,除其它外,是加强联合国作用的理由,这将使国际社会可以合法和有效地处理人道主义局势。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为发展预防文化提出的想法和概念——如人道主义干预、为跨国公司提议的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安全影响评估——应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彻底研究和仔细审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大会作为联合国的唯一民主、普遍和透明机构是深入分析这些想法影响的适当论坛,以防止人道主义大灾难并在出现

时加以处理。必须维持《宪章》体系的完整性是这种努力共同出发点。

同时,回顾国际社会有时未能合法干预人道主义灾难局势是有益的。这种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会员国不愿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卢旺达和一些其它类似情况已经使人们对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反应的连贯性产生怀疑。联合国不应允许有时无法控制的因素——媒体报道、政治和地理——对其回应危机和分配资源的方式起重要作用。

人员伤亡、自然灾害对人民生计的严重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最近几十年这些灾害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快速增加清楚表明,必须制订预防自然灾害和减轻其破坏性影响的有效战略。

贫困加剧自然危险的影响,并增加社会易受自然灾害伤害性。消除贫穷及其在减轻这种危险方面的重要性应是旨在制定预防自然灾害战略的任何研究的组成部分。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表明的,全世界所有灾难受害者的 90%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源和不正确的建筑和住房修建法则、砍伐森林、荒漠化、破坏湿地以及其他环境玩忽职守使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大。在所有情况中,预防将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损失,这种损失从 1960 年代 520 亿美元增加到 1990 年代 4 790 亿美元。

预警、应急计划、准备措施和减灾是减少自然危险频率和影响的重要因素。应在联合国主持下作为执行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相关行动组成部分建立国际协调一致的框架来改进预警,其办法是提出关于有效国际机制的建议,包括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透过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国家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的国际援助改进减少灾害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包括在各级设立学科间和技术网络对于成功执行国家方案也是必要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也应参与准备措施和减灾以处理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为此目的技术援助和交流正确作法的信息十分有益。

普凡泽尔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同先前发言者一样,我谨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了领导能力,并且发人深省。

如何防止武装冲突并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采取行动是我们大家面前的重要挑战。在这方面,秘书长提出了应该得到广泛公众注意和有力支持的全面对策和一套想法。预防冲突和人类痛苦也是奥地利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主题。今天我只补充几点。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他说预防武装冲突是联合国的最高目标。这当然绝不意味着片面强调和平与安全而损害联合国其他优先任务,如发展或人权。的确,最近历史表明这些事项如何相互依存。今天的多数冲突产生于团体和个人有关人身安全和福祉、政治和经济参与以及文化和宗教表达的关切受到威胁和剥夺。因此,目前需要的是包括所有政策工具的广泛办法:从预警和预防性外交到目标明确地使用发展合作工具以处理冲突的起因。迄今为止主要从冲突后的角度来看的建设和平,在预防战略中起着显著作用。

各种群体之间不平等现象和国家内部没有安全是不稳定和爆发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护或恢复稳定,我们必须为个人和社区提供人的安全。为了克服不平衡情况,在社会各级应有更公平的治理进程。现有资源应该用于使社会所有群体可表达意见并制定一套内在的解决冲突机制,在发展成重大问题前处理群体关切。善政必须是预防冲突战略的组成部分。

因为防止武装冲突首先要求认真地分析目前局势,因此奥地利欢迎探讨评估发展政策对冲突影响的想法的建议。在我们自己的发展合作框架内,我们正在制定全面的预防冲突战略,综合所有可获得的工具,从协助和调停到目标明确地使用发展合作工具。我们的目标是既促进可持续发展,又促进可持续和平。

我们应该确定传统的预防冲突工具,同区域组织合作改进预警能力和早期回应战略;通过官方和非政府特使或建立小规模现场政治驻留进行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性裁军,特别是在小型武器和轻武器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预防性步骤迄今为止未得到利用。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预防性步骤的可能性,以便在我们的回应战略中更好地利用它。

国际社会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各国有时不愿承认早期行动对防止潜在危险局势升级的必要性和好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其最强大成员常常缺乏在冲突早期阶段进行政治、财政或其它参与的意愿。这种不幸综合情况,一方面有关国家坚持不干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愿作出政治承诺并提供充分的集体资源,可能造成可怕后果,尤其对平民。

因此,我们需要各方面的政治意愿和承诺来采取预防战略。有关国家应十分明智,在早期阶段接受调停、谈判或和解方面的必要国际支持;国际社会应严肃对待预警并在尽早阶段采取适当行动。联合国必须能够缩小预警和早期行动之间的差距。

我的最后一点突出强调安全理事会的特别责任。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安理会必须加强其采取行动的能力。必须让人们看到安理会是根据对实际要求的客观估价,而不是其成员的主观利益行动的。不能接受的是把在根本上属于全球性的责任宣布为是地方性的,尽管有时显然没有维持和平的地方或区域能力,或这种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奥地利欢迎秘书长关于为干涉一场冲突的决定规定明确和可以判别的标准的看法。需要公平和客观的采用这些标准,无论是在非洲、美洲、亚洲或欧洲。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在就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的第1265(1999)号决议的后续行动中得到优先注意。这种做法将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一起构成成功的预防冲突的基石之一,即可信的威慑的健全基础。冲突各方必须知道,他们可能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响。所涉及的个人必须知道,他们的行动不能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动负责。

在大会中涉及了预防冲突的这种全面作法很多具体方面:社会协调、消灭贫困、对少数人和人权的保护、民主治理、维持和平以及国内和国际关系中的法治。我希望,每一个主要委员会都将作出共同努力以促进联合国成功的制定一项预防战略。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对秘书长报告的意见将限于两个问题。第一,在他的载于文件A/54/1中的报告第81段中,秘书长通过描述美国和联合王国在1998年12月16日对伊拉克的侵略而对有关伊拉克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

“在伊拉克继续不遵守决议的情况下,两成员国使用武力……是可以预见的。”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伊拉克履行了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在1998年2月与秘书长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承担的义务,而没有遵守和甚至提出关于伊拉克遵守情况的误导性报告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的前领导人理查德·巴特勒。他这样做是为了对侵略伊拉克辩解。特委会是美利坚合众国使对伊拉克的封锁永久化并为其对伊拉克的侵略辩护的工具。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是特委会视察组的成员;他们非法装置了监听和间

谍设备,以监测伊拉克官员的行动和通讯。巴特勒先生过去曾经直接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夫人那里领取指示。

前视察员斯科特·里特承认了这一点。美国行政当局也没有否认。秘书长1999年6月27日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关于特委会视察员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不完全正确。

在1998年12月16日的侵略发生几小时之前,巴特勒先生在得到美国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指示后将特委会工作人员撤出巴格达监测和核查中心,他这样做既没有通知安全理事会或秘书长也没有他们的授权。这不是视察员首次根据美国的指示在没有通知安全理事会或安全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撤出伊拉克。他们曾在此前的1998年11月撤出过一次。

巴特勒先生在1998年12月15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份误导性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宣称伊拉克不与特委会进行合作。安全理事会的多数成员对该报告持不赞成的态度。在侵略开始两小时后举行的安理会正式会议上,一个常任理事国说,

“特委会领导人在此危机中起了不光采的作用。特委会向秘书长提交的有关报告以偏概全,回避事实。特委会领导人对目前的危机难辞其咎。”(S/PV.3955,第5页)

安全理事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说:

“目前的危机是人为的,其部分原因是特别委员会执行主席理查德·巴特勒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今年12月15日夜提交的报告严重歪曲了真实情况,并断言伊拉克没有充分合作。该结论没有为事实所证实。”(S/PV.3955,第4段)

因此,前面提到的秘书长报告第81段中的话“在伊拉克继续不遵守决议,两个会员国使用武力……是可以预见的”实在是荒诞之极。在安全理事会已开会辩论伊拉克问题时,美国和联合王国在1998年12月16日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确实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权威和历次决议。

几小时以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在会上不赞成谴责或批评了美英对伊拉克的侵略。一个常任理事国在会议中提到:

“……美国和联合国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各国在世界舞台上公认的

负责行为准则和规则。这基本上危及……整个国际安全制度。”

“选择以单方面武力行径解决同伊拉克的问题的国家必须为此类行动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任何国家都无权代表联合国独立行动,更不能行使世界警察的职能。”(S/PV.3955,第5页)

不结盟运动也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径。该运动在1998年12月17日的一项声明中,谴责各别国家在无安全理事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拉克采取的公然违反《宪章》的军事行动。这证实了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这一侵略行径。

我们本希望秘书长的报告会表达国际社会关于对伊拉克单独使用武力的看法,特别是因为报告的另一部分谈到在科索沃使用武力的问题。

“在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将危及《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使用武力方面,唯有《宪章》提供了普遍接受的法律依据。”(A/54/L,第66段)

我借此机会重申,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对1998年12月16日犯下的侵略行径负有法律责任,这一行径夺去数百伊拉克公民的生命,在侵略期间则摧毁了基础设施及经济和教育设施。

伊拉克阐明了它要求对由这次侵略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合法权利。安全理事会必须与伊拉克交往中表现出公正,追究侵略者对侵略的责任,这样才能表明它不是有选择地行事及实行双重标准。实际上,我们怀疑它会这样做。

关于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的问题,我们赞成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南方各国的看法,它们提到这种设想违反国际法、《宪章》和当代法中诸如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它国内政等主要准则。

不结盟运动的德班首脑会议重申,人权不应当作干涉它国内政的政治借口。1970年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指出: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第三原则)

另一方面,大多数国际法学家反对以人道主义理由进行干涉的原则,原因有如下三条:第一,《宪章》和当

代国际法并不包含这种权利;第二,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家间的行为除在少有的情况下则并未出现过这种干涉;第三,滥用的可能性会产生不诉诸这一原则的强烈动机。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盟约》以及其它国际文书,为处理侵犯人权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需要的是启动这一机制而不是忽视它或把它搁置一旁。

在这个由仅仅一个肆意的大国控制的当今世界中,推行诸如人道主义干涉的新设想的企图,不会确保国际安全。相反,它们会威胁国际安全,而第三世界各国将会成为第一批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扩大预防性外交,以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根源,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南方各缺乏发展和在政治和经济上持续边缘化所造成的。

那么,用人权反对主权会使哪些人受益?什么是确定需要干涉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性质所必须的客观标准?能否忽视外部干涉在破坏发展中国家内部条件稳定以及在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稳定奠定基础方面的作用?对侵犯人民的发展权利以及对这些人民实行单独或多边的经济制裁的情况又应怎样处理?谁将决定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谁将决定进行干预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特别是因为一些法学家认为:被一些国家认为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干预,被另一些国家看作是对人类的犯罪。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均有法律和政治的一面。因此,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需要在各国及联合国的成员国的参与下根据《宪章》的原则予以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大会是进行这种审议的恰当论坛。

阿布·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高兴地就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而向他表示感谢。该报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在我们翻过本世纪最后几页之前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最后一份报告。

秘书长借此机会给我们提出了一种看法,不仅涉及一年的工作,而且也 对 50 年前《宪章》建立的集体安全概念框架内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社会运作效率的概念进行了评估。他给我们的不是一份叙述性报告,而是一份以其权利、责任和自行斟酌权为依据的报告,提出了旨在对付他所认为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看法和倡议,以及有关联合国如何才能对政治、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作出回应的构想。

尽管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遵守对联合国年度工作报告所涉问题的传统分类,但我们认为他似乎集中论述了题为“面临人道主义挑战”的导言标题的思想。

从这个思想出发,报告详尽叙述了为避免武装冲突升级而扩大预防性措施的问题。通过在一种不断演化和一概适用的框架内扩大安全理事会在战争与平时时期干预侵犯人权局势的特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并使其合法化,秘书长的理念正是以对这一构想的论述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在秘书长的各项报告和发言——例如他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及其在大会本届会议的发言——以及联合国系统各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报告员提交的报告中,追叙这一框架的发展历程。

我们认为,对此作详尽阐述是因为国际社会未能面对紧急人道主义局势,这也是对联合国在科索沃危机期间所受批评的一种反应,科索沃危机曾使得有些人说,联合国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我必须在这里忆及,联合国未能对科索沃危机作出回应是因为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遇到障碍。因此,给予安理会新的权利不一定会弥合国际法律制度中的差距。确实弥合该差距的办法是改革阻碍安理会有效工作的工作方法。

的确,世界目前面临着紧迫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他对这些问题的升级负有特殊责任,必须为避免其重演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建议。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报告提出的我们应该在坚持《宪章》的原则与平衡时优先考虑实际因素的主张。的确,我们必须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保护个人权利时小心谨慎,不要采取违背《宪章》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能想象有什么必要性甚至实际因素会使我们在维持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概念方面违反《宪章》的原则。如果意图是处理《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大厦所固有缺点,那么就应通过法律渠道和《宪章》规定的措施这样做。

在这方面可以采取若干集体措施。无论我们的理想目标如何,守法都是人们为避免不和而必须遵守的神圣义务。在国际社会框架内工作而没有对法律权威达成明确和准确一致,确实是十分危险的。弱小和欠发达国家不能容忍或忍受这种局面,任由更发达和更强大的国家把国际社会拖入弱肉强食的境地。

我们衷心支持这样一个构想,即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抵制任何在武装冲突时攻击平民或使其受侵犯的有组织进程,而无论它是在国际争端框架内,还是在国家失去控制其领土能力的国内局势中。我们必须通过忠实适用《宪章》惩处此类行径的肇事者。

保护人类和在安全与和平中生活的权利,一直是所有文明社会演变的神圣目标,今天,我们看到,给予保护

人类的空前优先得到了更大和理所应得的集中关注。我们坚决支持这样做。但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强调国家在保护社会和维护其价值观念与原则方面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在保护人类过程中受到驱使而破坏我们所知道的国家这一牢固法律实体。我们在国际社会听到有人通过全球化现象和国际合作重新定义国家主权概念和与之相对的所谓个人主权,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和法律考虑的综合全面框架内得到认真和谨慎的处理。这个框架将进一步维持国际社会大厦,以及各国在和平与稳定中生活、其内部事务不受干涉、其国内稳定和文化风格不受破坏的权利。我要在此重申,人道主义干预概念尚未在法律体系或国际盟约、决议和公约中得到任何反响。

根据这个看法,我们欢迎并支持安全理事会随时准备依照《宪章》的标准,并在其自己权限内,对把平民当作目标或故意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局势作出回应。但是,我们必须铭记,安理会必须在其《宪章》义务框架内执行其任务:这就是说,它必须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干预。

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我们必须在人权领域摆脱双重标准。国际社会必须对导致平民生命损失的一切冲突局势予以平等关注,而无论它们发生在那里,而且也不得只注重某一国家的个别政治考虑。另外,安全理事会对任何国家集团都不应给予优先。

这些创新概念突出表明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构想,虽然正如我所说,这个观念尚未制定,也没有获得协商一致。这些构想还提出了侵犯国家主权问题和发展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到的预防危机文化的尝试。

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今年9月23日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为了适当地考虑这些意见,我们应该停下来,以应有的严肃态度研究和考虑这些意见。鉴于这些意见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它们有了新特点。

埃及部长还指出,对于预防性行动概念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指出,如果我们走上这一道路,我们就必须严格遵守国际合法性准则和原则,完全按照《宪章》规定的机构和法律构架行事。

这一问题显然非常复杂和敏感。它涉及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与特权,主要是《宪章》第24条。这一条确定威胁概念,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对一国内政的任何威胁的规模。而且,它还规定了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权力,因为大会是联合国全体成员组成的机构。该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规定之间的平衡、区别,以及这两章同国家意愿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大量研究和审查。

秘书长在9月20日介绍他的报告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探讨,以便达成有关每一个问题的具体标准。

因此,在我国相信需要在一个综合和全面观点的架构内改革联合国的基础上,阿姆鲁·穆萨部长提议,我们通过在一个适当机构范围内最坦率、透明的国际对话来讨论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埃及外交部长要求大会主席和秘书长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使大会或者大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能处理和仔细探讨这些建议,以便所有国家一致通过。他还建议秘书长向下届大会递交一份报告,概括这一辩论的结果,以便能对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今天我们有机会笼统而全面地审查了秘书长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以便就这些意见和概念对已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包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不容许在尊重人权考虑架构内侵犯国家内政等准则的影响得出结论。

因此我们提议在一个有关《和平纲领》的工作队范围内讨论这些意见,因为这样一种工作队处理的主题事项同现在讨论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主席先生,我们希望作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能够发起一场积极和公开的对话,同所有有关各方协商,以便商订一种拟议的工作方式。

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秘书长提出具有深刻见解和发人深醒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A/54/1)。我认为,这份报告为我们今天在此的审议和我们在大会整个第五十四届会议上的审议,提供了有意义的基础。

正如报告指出,1990年代,自然灾害和内战已经成为对个人和人类社区安全的主要威胁。这十年中的武装冲突,90%以上是内战,而且内战的比例从1998年以来已进一步增加,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此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是1960年代的三倍,而且这种趋势今后很可能继续。

这些数字对我们期待二十一世纪的乐观态度投上一层不肯定的阴云。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联合国系统各个论坛,重申我们的政治意愿,汇集我们的集体智慧,去应付这些艰巨的挑战。

鉴于这一任务,我们由衷地希望,明年的千年大会将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明确的前景和指导原则,来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在二十一世纪克服这种挑战。为了使千年大会成功,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认真参加筹备进程,并且表现出一种和睦与妥协感,以加快这一进程。主席先生,我们也指望你以干练的领导和智慧成功地指导今后数月的筹备工作。

现在让我谈谈和平与安全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重要问题。过去一年,世界许多地区遭受暴力冲突的严重破坏。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国际社会未能对世界各地的不同冲突作出一贯的反应,因此有时使国际准则受到怀疑,并偶尔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在有些问题上国家主权原则占上风,而在其他问题上确实人道主义考虑优先。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发言中非常恰当地指出的,因此,联合国主管一些冲突解决进程,但在其他冲突中却只能退居后座。

在这一背景下,很容易理解秘书长谈到了下一世纪人的安全和干预的前景。世界事务现在发展的方向导致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已逐渐开始把人的安全看作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更加重视人道主义干预的事项。秘书长所提出的主题——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的确是很恰当的。这一点提得正是时候,它无疑将给国际社会提供今后几年里应予深思的问题。事实上,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对正在出现的人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干预概念的激烈辩论。

尽管在某些冲突局势中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在原则上认为,这一干预必须遵循在《联合国宪章》中商定的普遍原则。我们希望,联合国内所开展的认真辩论将帮助国际社会确定可普遍接受的、在尊重主权和尊重人权之间取得平衡的人道主义干预准则。

全球化新时代使每个国家在寻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机会,也遇到挑战。全球化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或人口群体所得到的好处往往由于其他人的边际化而抵消。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报告,我们要敦促作出集体努力,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纠正全球化的不公平现象。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在开展秘书长去年所采取的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主动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全球化不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生活几乎每个方面的一个现实,因而必须由整个联合国系统来处理。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全球化的扩散可能产

生出现“非民间社会”的意外后果。秘书长的报告恰当地提醒我们,全球化无疑助长了全球范围的有组织犯罪,这有可能既破坏社会结构,也破坏国际和平。

为了减轻全球化所引起的差距,国际社会应加倍努力,消除贫穷。消除贫穷将创造一种使基本人权得以蓬勃发展的气氛。另一方面,如果赤贫现象得以继续下去,那么它将会撒下冲突的种子,最终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有句老话说,找钱买药很难,而找钱买棺材却很容易。为了避免落入这一陷阱,国际社会必须更加优先重视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建议到2015年将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数量减少一半,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积极推动加强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的努力。

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国际人权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是产生于过去100年里所通过的各种公约,其中最早的是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所通过的公约。我们现在负有庄严的责任,必须以过去各项成就为基础塑造一个新的千年,使人权文化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这应该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尽管存在人权法律制度,但我们愤怒地目睹了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世界许多地区却仍在发生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灭绝种族和其他危害人类犯罪行为。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坚决地处理危害人类罪问题,必须消除让违反人道主义法的人逃脱惩罚的做法。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法律构架,确保所有国家和个人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各项人道主义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在这方面,我期待着国际刑事法院早日投入运作。

我们认为,必须开展广泛的努力,促进对人权的自愿尊重。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长今年所颁布的维持和平人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确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我们悲哀地注意到,平民在最近的武装冲突中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此外战争和饥荒导致了大规模难民危机。由于邻国收容了绝大部分难民,因而要使援助产生作用,就必须有邻国的参与与合作。尽管政治或经济情况使邻国难以接收难民,但是它们不应不考虑人道主义因素,拒绝接纳难民或者将他们遣返。国际社会还必须制定适当的办法,以减轻邻国因难民大量涌入而承受的财政负担。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重申大韩民国致力于加强联合国,重申它积极参与和推动我们为应付世界在二十一世纪所将面临挑战的集体努力。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南非政府,感谢秘书长提交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全面报告(A/54/1)。该报告在对联合国至关重要的领域为我们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秘书长1999年9月20日在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所作的讲话具体地着重谈到下个世纪人的安全和干预的前景。我国代表团谨借今天辩论的机会,表示赞成秘书长决定强调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向他保证我们将支持他指导联合国渡过这些困难阶段。

秘书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联合国须如何应付世界各地的政治、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在应付这一挑战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将讨论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讨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第二,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干预的实际影响。为了公平对待这两个部分,我们也许需要时间进行更多的思考,不应草率地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在南非看来,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原则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南非在1945年作为创始会员加入了联合国。当时南非由一个白人少数政权所统治,该政权实行一种种族歧视的国家政策,它被称作“肤色障碍”,后来又被称作种族隔离。

与此同时,若干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其中最显著的印度政府,开始对南非种族歧视性的隔离政策提出了挑战。南非少数人政权对此回答时争辩说:该问题是一个内部问题。真令人羞愧啊,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当时竟同意这种看法。在1950年代后期结束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当时出现了由克瓦姆梅·恩克鲁玛的加纳为首的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反种族隔离的呼声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在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断然拒绝种族隔离是内部事务的说法,在此之前世界目睹了对69名于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维尔进行反种族隔离示威的人进行的大屠杀。渐渐地,联合国被迫处理种族隔离问题。当然,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及其最终战胜种族隔离的斗争所做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和值得充分赞扬的。

但对南非来说,问题仍然存在:早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否本会使我们的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情况有所不同?它本会减少我们人民多少损失和痛苦?南非人经历了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后情况是否更好了一些?只有历史能回

答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确切知道的是,秘书长1999年9月20日的发言引起我们南非人的强烈共鸣。

秘书长的发言及其颇具价值的报告及时和必不可少地呼吁立即真诚地就下一个世纪人的安全和干涉的意义进行辩论。我国代表团相信,为了联合国会员国集体探讨潜在和实际的危机,我们的国家利益始终必须服从民主、多元化、人权和法治这些《宪章》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国际关系体系民主化,而且应该从正确改组联合国做起。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列入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六年来不断地讨论,而且还未就我们试图做些什么达成基本的共识,所费的时间真是太长了。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当强制性干预被视为需要时,安全理事会作为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应该有能力站出来应付挑战。但在这一时候,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安全理事会并不是世界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唯有通过有意义的改革,安全理事会才能够始终如一、民主、合法和透明地行事。

南非政府同意秘书长的看法:本组织对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承诺如欲变得合法必须具有普遍性。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采取迅速和早期的预防性行动,以确保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大多数潜在和实际的危机。联合国应选择在派遣维持和平人员的必要出现之前解决冲突。为有效与合法地处理包括蓄意和严重违反人权在内的冲突的预防和结束问题,安全理事会应该变得更为民主并对更多的会员国负责。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会员国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这一机构中缺乏充分和适当的代表性的情况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

此外,南非还及其担忧不断恶化的联合国财务情况。缺乏财务手段和同样严重地缺乏道义和政治意愿,在这一方面将严重限制我们预防并结束冲突,可持续地重建冲突后的社会和迎接全球化进程所带来挑战的能力。因此,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按时、全额和不带先决条件地缴纳分摊会费。

明年,联合国将主办千禧年首脑会议和千禧年大会。我们在此的所有代表团都必须站出来迎接挑战,回答将最终确定我们想象中的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和我们希望向全人类提供哪一种生活的各种问题。

姆贝基总统在最近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富有远见地想象到了我们胜利完成工作所需知道的所有

情况。特别是,姆贝基总统要求通过一项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他说:

“所需的是,我们必须相应地就我们已经表示的信念采取必要的行动,这种行动将切实地处理有关的和平、民主和发展问题”(见 A/54/PV.4)。

阿迈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就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向他表示感谢,这份报告既介绍了国际形势,又列举了国际社会在试图迎接这一国际形势所造成各种挑战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该报告还提出了旨在寻找有效办法应付这一形势的建议。

秘书长着重指出了本组织在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秘书长提到的各项问题中,他强调了当本组织未能解决影响集体安全的问题时干预的合法性问题。

如秘书长所指出的,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种不同解释,我不想再继续争论。但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尊重国家主权是一项不容违反或肆意践踏的原则。因此,我国坚决反对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以任何口实,包括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联合国宪章》应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唯一法律基础。在这一框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是公然违反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各项文书,尤其是《联合国宪章》,这些文书禁止动用武力,或威胁动用武力或干预别国内政。《宪章》指明了在处理任何威胁到国际安全的人道主义或其他问题时,应该动用那些机制。它规定了实现此类目的的有关机制,例如大会,这些机制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以便有能力处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反对以人道主义援助面目出现的绕开国际机制或渠道的企图。忽略这类行为将为干涉别国内政提供口实,因而损害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秘书长的报告谈到了为解决区域和国际冲突而作出的努力。许多冲突通过谈判手段得到解决。这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据报告称,非洲的和平前景确实有所改观。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秘书长支持非洲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我们认为,正如秘书长所言,必须作出其他更大的努力以解决其余的危机,并防止危机影响或威胁到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认为,只有在全球范围寻求解决非洲问题的真实原因,同时强调非洲自身确定的优先考虑。非洲统一

组织关于解决冲突的决定必须得到支持,与此类义务有关的负担必须共同承担。这是解决南部非洲国家存在的动荡局势的唯一途径。

非洲充分意识到,它必须应付摆在它面前的发展挑战,但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合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只要免除目前高达 3 500 亿美元的全部非洲债务,非洲国家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秘书长称为非洲大陆最大挑战的贫困灾祸。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努力,以消除威胁 29 个非洲国家人口的疟疾和艾滋病。

我们希望感谢秘书长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发展集团的努力,但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必须编写研究报告,推动提高非洲商品的价值,并制订实现机场、海港和公路系统现代化的计划。非洲要求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对非洲人的同情、博爱或高谈阔论。这一点必须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达到。

对平民的禁运也导致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要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愤慨,因为对利比亚实行的制裁是出于报复心理,建立在纯粹的猜测而非事实基础上。利比亚人已因这些制裁受害长达七年之久。

更糟的是,美国因国际均势被打破而受益,推动安全理事会对利比亚实行禁运,随后又阻止安理会取消禁运。甚至在法院还没有作出裁决之前,美国就已要求利比亚向泛美航班失事者的家属支付赔偿。这就偏离了国际法的既定原则,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这一原则。国际社会许多成员都要求立即取消禁运,因为利比亚充分服从了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方面的有关决议。

联合国内涉及国际法的活动很多。对旨在达成多边协定的谈判提供了援助,我们对此非常满意。但我们必须加强努力,在联合国的各种国际讲坛上显示对国际法的尊重。但此类呼吁往往受到蔑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一些国内法,应用治外法权。《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肯尼迪法案》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将庆祝联合国国际法十年。我们相信,这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次机会,重申其不允许任何国家将其国内法应用于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必须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撤销此类背离《宪章》精神的法律。它们损害了国家主权,是对别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下午 12 时 30 分散会